西漢南海遠航之始發點

(提要)

本文綜合、分析前人對《漢書地理志》等史料的研究，認為由南海至印度洋的遠航路線開闢於西漢，當時對外遠航發舶的主要區域應在北部灣，主要起航點為日南以及徐聞、合浦，而非番禺。文章提出了中國古代對外航海史的下列現象，希望引起進一步的研討：除了某些海禁、閉關時期外，中國對外海路交通的主要起航點出現由南而北逐漸轉移的趨勢。在兩漢，對外遠航的主要起點在日南，形成《漢書地理志》所載的交州日南對外航線；吳晉至隋唐，廣州大為興盛，而以《新唐書地理志》所記的廣州通海夷道為標誌；南宋至元代，泉州一度領先，故有《夢粱錄》由泉州放洋過海泛往外國的記載；到了明初，起航點北移至福州、蘇州，故鄭和下西洋自五虎門或劉家港出發；及至清代，上海成了全國最重要的對外交通貿易港。

The Ports of Embarkation for Long Range Voyages via the South Sea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n analysis of earlier studies on Han-Shu-Di-Li-Zhi (漢書地理志) and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long range sea-routes to the Indian Ocean via the South Sea were started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Seafaring activities at that time concentrated in the Beibu Bay. The major ports of embarkation were Rinan, Xuwen and Hepu, instead of Panyu.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major ports of embarkation for long range voyages changed over time, shifting gradually from south to north. In Han Dynasties, the major port of embarkation was Rinan which was recorded in Han-Shu-Di-Li-Zhi (漢書地理志)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Jiaozhou sea-route. From Wu Kingdom and Jin Dynasty through Sui and Tang Dynasties, Guangzhou was a busy sea port and was marked "the Guangzhou channel to overseas" in Xin-Tang-Shu-Di-Li-Zhi (新唐書地理志). From Southern Song to Yuan, Quanzhou was for a time the most important sea port in China. There were records in Meng-Liang-Lu (夢粱錄) showing frequent departures from Quanzhou for foreign cuntries. In early Ming, the most popular points of embarkation shifted north to Fuzhou and Suzhou. Zhenghe embarked upon his voyages to the Western Ocean from Wuhumen and Liujiagang. By Qing time, Shanghai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prot for overseas trade and communication.

波濤洶湧、廣闊無涯的南海，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海上對外交通最主要的區域。人們常常愛說"海上絲綢之路"或"陶瓷之路"、"絲瓷之路"，然而所謂"絲綢之路"，不論陸道、海道，應指中國對西方的遠程交通，而非周邊鄰近的中外交往。南海向西的遠航究竟起於何時？按照上古時代的科技水平，初期航海多沿岸邊而行，故大規模的遠航不可能太早。

就中西交通而言，西漢實可謂開拓時期。彼時陸道固有張騫之"鑿空"，而海道由南海至印度洋的遠航路線也闢於西漢，與張騫通西域大致同時。在這一方面，最早最詳而又最明確的史載，莫過於《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的下列記述：

> "粵地……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
>
> 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為儋耳、珠崖郡。……元帝時，遂罷棄之。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户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燿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

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此段史料尤其是涉外地名，近百年來迭經中外史家考證，然迄今猶言人人殊、未有定讞，有些今地比附之差距實不可以道里計。例如，黃支今地究在何處？自藤田豐八、費瑯定在印度東南岸後，頗得眾人之擁護，但也有的考在馬來半島或印度尼西亞乃至非洲。至於航線中經諸地，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本文不打算探討西漢時的涉外地名，而著重分析當時遠航路線的始發點，唯將有關論著作為附錄詳列於後，並不一一另加註釋。

本來上引史料所述的西漢南海遠航之始發點，似乎相當明確，不應有太大問題，可實際上卻有不少意見分歧，諸如：對“障塞”如何理解？徐聞、合浦古港的今地何在？為何《漢書地理志》未提及遠航印度洋的始發點是番禺？而對於“障塞”等的分歧，還常常表現在不同的斷句或標點上，茲略介諸說如下：

(一) 動詞說：〔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

此說見於韓槐準的〈舊柔佛之研究〉，認為“日南即今安南順化一帶，漢武帝始置郡，所謂障塞，或指地方擾亂不能從陸路通行”。吳景宏〈秦漢時代中菲關係之探討〉的意見相同。

(二) 名詞說：

1.〔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

論者多採此說，以“障塞”作邊徼要塞解，把日南邊塞與徐聞、合浦同列為西漢遠航的始發點。

2.〔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

汪遠孫《漢書地理志校本》謂“案障塞無聞”(《二十五史補編》)，或以之為不可考的地名。王先謙《漢書補注》云：“朱一新曰：障塞猶築亭乘障塞之障塞，非縣名也。汪氏云障塞無聞，殊誤。”李長傅《中國殖民史》即作如上之標點，並於障塞旁加專名號。

3.〔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

蘇繼廎《南海鉤沉錄》認為此徐聞、合浦與雷州半島一帶的徐聞、合浦為同名異地，屬於日南障塞，“可假定徐聞在西捲海口，合浦在象林海口”。

4.〔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

王新民、韓振華〈紀元前中國南洋交通考(漢書地理志附錄考)〉初解作：在中國最南部邊界小城，“途聞合浦船行……”(韓說)或“慢慢聽到”合浦船行……(王說)。但後來韓先生在〈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一世紀間中國與印度東南亞的海上交通——漢書地理志粵地條末段考釋〉已修正為“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贊成“徐聞即今雷州半島南端的徐聞縣”。

按上述將徐聞、合浦置於日南郡內，僅屬假定，可置不論。將“障塞”作動詞解，雖不無可能，然西漢時未聞日南地方有大亂事，缺乏有力之史料可為佐證。而觀諸兩漢史籍，大量材料均可說明上引“障塞”乃普通名詞，既非動詞更非專有地名。茲不厭其煩引錄如下：

《史記》　卷七〇〈張儀列傳〉：“除守徼亭鄣塞……”。

卷一一五〈朝鮮列傳〉：“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

置吏，築鄣塞”。

《漢書》　卷九四下〈匈奴傳〉：“障塞破壞，亭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

《後漢書》卷六〈順帝紀〉：“嚴敕障塞，繕設屯備……”。

卷二〇〈祭彤傳〉：“又遣諸將分屯障塞……”。

卷廿二〈馬成傳〉：“繕治障塞……”。

卷廿四〈馬援傳〉：“行雁門、代郡、上谷障塞”。

卷四七〈班勇傳〉：“……以逼障塞”。

卷四八〈應劭傳〉：“故數犯障塞……”。

卷八七〈西羌傳〉：“障塞亭燧出長城外……”。

卷九〇〈鮮卑傳〉：“況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乎！”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下列兩處記載：

> 《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提到，漢元帝曾派人口諭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
>
> 《後漢書》志廿八〈百官五〉載：“邊縣有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備羌夷犯塞。”

原來南、北方均有障塞，並設障塞尉治理，則該名指邊徼要塞地區甚明。所謂日南障塞，即位於西漢最南邊的日南郡邊疆，再往南便是史書常常提到的“日南徼外”了。至於其今地，由《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記載看，日南障塞=日南象林界，即日南郡最南一縣。西漢象林縣治所，應即後來林邑國的早期都城典沖，位於武嘉 (Vu Gia) 河畔維川 (Duy Xuyen) 縣南的茶蕎 (Tra Kieu) ，但其南境應達到華列拉角 (Cap Varella) 和大嶺 (Dai Lanh) 一帶。

除了日南障塞之外，對於徐聞、合浦的考證亦不無歧見。徐聞

是西漢合浦郡郡治。其今地，《廣東歷史地圖集》標在海康即今雷州，廣東省博物館〈廣東徐聞東漢墓——兼論漢代徐聞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一文及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主張在雷州半島南端即今徐聞一帶。據陳序經〈東南亞古史初論〉(載《陳序經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意見，航船如由海康出發，須繞過危險的瓊州海峽，故或置於雷州半島南端為是。合浦則在今廣西北海市北面，與今合浦大致同地。另關於西漢、東漢合浦郡的郡治，《中國歷史地圖集》均標在合浦，而《廣東歷史地圖集》均標在徐聞；然《漢書地理志》載合浦郡縣五，依次為徐聞、高涼、合浦、臨允、朱盧，《後漢書郡國志》之排序則改為合浦、徐聞、高涼、臨元、朱崖，顯見該郡郡治在兩漢有別。

由上所述，作為西漢南海向西遠航之始發點，日南障塞、徐聞、合浦三地是無可懷疑的。可是古代廣州亦即番禺呢？近年來，論者多據《淮南子》所記“番禺之都”與“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史記貨殖列傳》所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屬”，及一些考古發現，認為廣州是最古老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或東方發祥地，甚至主張上引西漢南海遠航之起航點應是番禺，日南、徐聞、合浦只是作為番禺的外港而記載(見下列書籍的部分論文：《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廣東省社會科學院1991年版；《論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古番禺是秦漢南海郡的郡治，曾為南越國國都。它無疑是秦漢之際乃至先秦時嶺南地區的一大都會，海內外商品輻輳的貿易中心，但不一定非是最早的對外啟航發舶港口不可，至少在西漢就未必如此。如果我們以“絲綢之路”指中國對西方的陸、海遠程交通，則其開闢似未能早於西漢，至於西漢則明見於官方歷史記錄。《史記》、《漢書》均為出自史官的正史，作者掌握了大量的公文，如果番禺確是西漢南海遠航之始發點，則似不應無載。誠然，當時番禺集合了無數供海內外貿易的奇珍異物，但其來源可能有多種多樣：或為古代國內所產，或由外航港口運至都會(“都會”也可理解為“都城”)，也不排除由

古代西南絲綢之路轉來。

在判定西漢南海對外遠航始發點的問題時，除了史載、文物外，還必須考慮兩個因素：⑴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屬漢朝版圖；⑵依當時航行水平，北部灣乃南海最佳對外航行區域。

若據歷史記載，西漢交趾、九真、日南等郡之對外交通，應較番禺郡頻繁。首先，漢代嶺南九郡所屬的交趾刺史部或交州刺史部，最初係以交趾郡治為治所，後來才移治今廣州。《後漢書》志廿三〈郡國五〉注引王範《交廣春秋》曰："交州治羸𨻰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信縣，建安十五年治番禺縣。"《水經注》卷三七引《交州外域記》曰："交趾郡及州，本治於此也。州名為交州。"羸𨻰縣今地，在河內西北一帶。由交趾至日南既為當時中國最南邊疆，州治又一度設於此處，其所瀕臨的北部灣自然成了海外交通繁忙地區，故東漢時究不事、葉調、撣國、天竺、大秦等頻從"日南徼外"來獻。反觀由珠江口出洋，如沿岸而行出北部灣，須經瓊州海峽，如由深海經海南島東面南下，須經七洲洋，而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崑崙"，若非後世航海科技水平提高，實難以達到。只有到東漢末以後，由於日南象林郡被林邑國所據，其沿海一帶已無復昔日之安寧，由北部灣出航逐漸變得危險，加上深海航行事業日益發展，故南海向西遠航多由珠江口直接南下。於是從六朝到隋唐，逐漸形成了"廣州通海夷道"，取代了漢代的交州日南航線。

北部灣既是西漢南海對外遠航的主要區域，為何將最南面的日南障塞放在前面，而非"徐聞、合浦、日南"呢？有無可能仍應標作"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即當時整個北部灣屬於交州刺史部管理的軍事要地——日南障塞，而北岸的徐聞、合浦均屬其所轄？綜觀《漢書地理志》載文，合浦、日南各郡條下縣名屬次分明，《後漢書百官志》所記障塞尉只設於邊縣、職掌有限，故似仍以三地並列為是。三地均可發舶，但其中首要起航點應為日南障塞。

總之，根據《漢書地理志》的明確記載，西漢南海對外遠航的主要區域應在北部灣。由此聯繫到後來的中國對外航海史，一個有趣的現象或應引起吾人的注意：除了某些海禁、閉關時期外，自古代到近代，隨著航海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內地交通貿易來往的日益密切，以及中央政府對全國控制的加強，中國對外海路交通的主要起航點出現由南而北逐漸轉移的趨勢。在兩漢，對外遠航的主要起點在日南，形成《漢書地理志》所載的交州日南對外航線；由吳晉至隋唐，廣州大為興盛，而以《新唐書地理志》所記的廣州通海夷道為標誌；南宋至元代，泉州一度領先，故有《夢粱錄》由泉州放洋過海泛往外國的記載；到了明初，起航點北移至福州、蘇州，故鄭和下西洋自五虎門或劉家港出發；及至清代，上海成了全國最重要的對外交通貿易港。

【附錄】 有關《漢書．地理志》中西航路記載之部分論述

〈諸蕃志譯註正誤〉，伯希和，原載於《通報》(Toung Pao) 第13卷，1912年，457-459頁；參見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一編，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112-115頁。

Albert Herrmann, *Ein alter Seeverkehr Zwischen Abessinien und Sud-China bis zun beginn unserer Zeitrechnung,* Berlin, 1913.

〈前漢に於ける西南海上交通の記錄〉，藤田豐八，原載《藝文》第五年十、十一號，1914年10、11月，後收《東西交涉史の研究 (南海篇)》，星文館1932年版，95-135頁。另見鄭師許譯文，刊《新亞細亞》7：5，1934年5月；《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何健民譯，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費瑯，刊《亞洲雜誌》*(Journal Asiatique)* 1919年5-6月號，451-455頁；參見馮承鈞譯本，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第71-114頁。

Laufer, B., *Sino-Iranica,* Chicago, 1919. 見林筠因譯，《中國伊朗編》，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

Luce, G. H., *Early Chinese Texts about Burma,* Journal of Burma Research Society, XIV:2, 1924, pp.90-99.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六冊，張星烺，輔仁大學，1930年；參見中華書局1979年校訂本，19-21頁。

〈前漢時代海上交通考〉，鄭師許，《交大季刊》14期，1934年。

〈讀前漢時代海上交通考〉，嚴挺，《人文》6：1，1935年2月。

〈漢書地理志通黃支國考〉，藤田元春，《史林》24：4。

《中國南洋交通史》，馮承鈞，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1-10頁。

《中國殖民史》，李長傅，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25-28頁。

〈見於漢書中前漢海上交通的蠡測〉，鄭師許，《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專刊》4期，1943年3月。

《南海に關する支那史料》，石田幹之助，生活社1945年版，18-20頁。

〈紀元前中國南洋交通考 (漢書地理志附錄考)〉，王新民、韓振華，《海疆學報》1期，1947年1月。

〈論漢代之陸運與水運〉，勞榦，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1947年。

〈古代南海航程中之地峽與地極〉，許雲樵，載《南洋學報》5：2，1948年12月。

〈漢書地理志已程不國即錫蘭說〉，蘇繼廎，載《南洋學報》5：2，1948年12月。

〈舊柔佛之研究〉，韓槐準，《南洋學報》5：2，1948年12月。

Duyvendak, J.J.L., *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 London, 1949, pp.9-12.

〈漢代與南海黃支國的交通〉，譚彼岸，《社會經濟學報》1951年第2期。

〈黃支國在南海何處？〉，蘇繼廎，載《南洋學報》7：2，1951年12月。

《中西交通史》第一冊，方豪，華崗出版有限公司1953年出版，154-155頁。

〈中菲關係史略〉，王德明，《主義與國策》43期，1955年。

《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章巽，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出版，第13-14頁。

〈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一世紀間中國與印度東南亞的海上交通——漢書地理志粵地條末段考釋〉，韓振華，《廈門大學學報》1957年第2期；另刊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南洋問題文叢》，1981年第1期；《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研究》，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52頁。

《隋唐史》，岑仲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575-577頁。

《南海貿易》第二章〈通往黃支的路〉，王賡武，原載《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學報》第31卷第2輯，1958年；參見姚楠等編譯《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8年版，24-38頁。

〈西漢對南洋的海道交通〉，岑仲勉，《中山大學學報》1959年4期。另見《中外史地考證》上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89-107頁；《東南亞歷史論叢》(2)，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1979年。

〈秦漢時代中菲關係之探討(下)〉，吳景宏，原載《大陸雜誌》11卷7期，後收入《中菲關係論叢》，新加坡青年書局1960年版，第91-111頁。

《南洋史》上冊，許雲樵，星洲世界書局1961年版，第44-47頁。

Paul Wheatly, T*he Golden Khersonese,* Kuala Lumpur, 1961, pp.8-13.

《東西文化の交流》，松田壽男，至文堂1962年版211-213頁。

《中菲關係史》，劉芝田，正中書局1964年版，186-191頁。

〈漢使航程問題——評岑韓二氏的論文〉，周連寬，載《中山大學學報》

1964年3期。另見《東南亞歷史論叢》(2)，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1979年。

《探索海上的絲綢之路》，三杉隆敏，創文社昭和四十二年(1967年)。

《陶瓷之路——東西文明接觸點探索》，三上次男，東京岩波書店昭和四十四年(1969年)。

〈前漢書地理志載中印航海行程考〉，徐玉虎，《人文學報(輔仁大學)》2期，1972年1月。

〈中國與東南亞航路的第一紀程〉，邱新民，載《南洋文摘》13：3，1972年；另見《東南亞文化交通史》，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文學書屋1984年版，157-163頁。

〈廣東徐聞東漢基——兼論漢代徐聞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廣東省博物館，載《考古》1977年第4期。

〈漢書地理志載中印航海行程之再檢討〉，李東華，載《史原》第8期，1978年9月。

〈東アジア古代海上交通史汎論〉，內田吟風，《(內田吟風頌壽記念)東洋史論集》，同朋舍1978年版，546-547頁。

〈漢代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海上交通和貿易關係〉，周連寬、張榮芳，載《文史》第9輯，1980年10月。

〈公元前後的中西古航線試探〉，李成林，《學術月刊》1980年3期。

〈《公元前後的中西古航線試探》質疑〉，汶江，《學術月刊》1981年第6期。

〈漢代中國與東南亞和南亞海上交通路線試探〉，朱傑勤，《海交史研究》3期，1981年7月。另見《東南亞史論文集》第一集，暨南大學歷史系東南亞史研究室，1980年；《中外關係史論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70-77頁。

Hall, D. G. E.,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MacMillan & Co., Ltd., London, Fourth edition, 1981, p.8.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三冊，譚其驤等，地圖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6頁。

〈中國南洋關係史概說〉，宮崎市定，《アジア史研究(第二)》，同朋舍1985年第四版，470-472頁。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史》，沈光耀，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87-188頁。

《廣州港史(古代部分)》，鄧端本，海洋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24-25頁。

《古代南海地名匯釋》，陳佳榮、謝方、陸峻嶺，中華書局1986年版，158、172、196、285、421、643、694、715、780、917、938、963、1010、1017、1020、1039、1053頁。

〈兩漢三國時期的印度洋航業〉，沈福偉，《文史》26輯，1986年5月。

《中外交通史》，陳佳榮，學津書店1987年版，52-57頁。

《天涯若比鄰》，張廣達、王小甫，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58-63頁。

〈都元國考〉，謝光，《世界歷史》1988年6期。

《中國航海史(古代航海史)》，楊熺等，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50-54頁。

《中國古代航海史》，孫光圻，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161-167頁。

《古代中國與亞非地區的海上交通》，張毅，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20-21頁。

《南海鉤沉錄》，蘇繼廎，台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30、129、184、190、298、396頁。

《海のシルクロード史——四千年の東西交易》，長澤和俊，中央公論社1989年版，53-60頁。

《廣州外貿兩千年》，陳柏堅等，廣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15-16、21-27、52-55頁。

《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孫毅夫等，人民畫報社1989年版，175頁。

《七海揚帆》，姚楠、丘進、陳佳榮，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版，29-34頁。

《漢文南亞史料學》，耿引曾，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6-8頁。

《海上絲綢之路》，陳高華、吳泰、郭松義，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9-11頁。

《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陳希育，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頁。

《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泉州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1-254、324-330頁。

《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廣東省社會科學院1991年版，2-3、36-38、55-58、68-80、86-89頁。

《南海絲綢之路文物圖集》，徐恆彬等，廣東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15-19、126-127頁。

《海上絲綢之路的新加坡》，邱新民，勝友書局1991年版，23-79頁。

《中國航海科技史》，章巽等，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30-31、110-111頁。

《陳序經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上卷，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版，95-101頁。

《簡明廣東史》，蔣祖緣、方志欽等，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80-83頁。

《論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吳家華等，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7-8、37-38、68-69頁。

《中國古代海軍史》，張鐵牛、高曉星，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3頁。

《(解說．插圖) 中西關係史年表》，黃時鑑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4、39頁。

《嶺南史地與民俗》，曾昭璇，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47-85頁。

《廣東對外經濟貿易史》，徐德志等，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3-14頁。

《南天餘墨》，姚楠，遼寧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104-105頁。

《廣東歷史地圖集》，司徒尚紀等，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5年版，13、98、126-128頁。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史》，李金明、廖大珂，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5頁。

《絲路文化 (海上卷)》，劉迎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2頁。

《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陳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71-73頁。

(1997年11-12月，全國中外關係史學會、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學術討論會上宣讀論文。後收入《廣東省博物館集刊》，1999年)